

● 宋史研究丛书·第二辑

# 探知集

● 漆侠·著



河北大学  
出版社

宋史研究丛书(第二辑)

# 探 知 集

漆 侠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善军  
封面设计:赵 谦  
责任印制:蔡进建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知集/漆侠著. —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12  
(宋史研究丛书·第2辑)  
ISBN 7-81028-587-4

I. 探… II. 漆…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宋代-文集  
IV. K24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0586 号

---

|                      |                        |
|----------------------|------------------------|
|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合作路1号) |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
| 印制:河北省新华印刷一厂         | 规格:1/32 (850mm×1168mm) |
| 印张:14                | 字数:350千字               |
|                      | 印数:1~1500册             |
| 版次:1999年12月第1版       | 印次:1999年12月第1次         |

---

定价:28.00 元

## 序

这个集子是继《知困集》而编成的，姑且名之曰《探知集》。

是集共收入了论文、序、跋 35 篇，大都是近八九年写成的。只有列于篇目中最后的五篇是 50 年代的作品，其中《范仲淹的历史地位》和《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两篇，则是 1952 年我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写成的。收入这两篇文字，奄忽 46 载，岁月催人，“不知老之将至”。

收入本集的开头几篇，其中有关宋学的三篇，即：《宋学的发展和演变》、《释智圆与宋学》、《晁迥与宋学》；有关方法论的一篇，是《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这几篇文字，大体上可以分作两个方面，是我过去几年和今后几年努力探索的重点所在。

驱使我于投老余年向宋学等新的领域进行探索的，是这样一个想法：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太少，也总是希望从不断的探索中，用新的知识充实自己；而只有这样做，精神上才能得到最大的慰藉，生活得更加愉快。一句话是，探求新知，充实暮年。集名曰探知，意思就在这里。

## 目 录

|                      |         |
|----------------------|---------|
| 序                    | ( 1 )   |
|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 ( 1 )   |
| 释智圆与宋学               |         |
| ——论宋学形成前儒佛思想的渗透      | ( 47 )  |
| 释智圆《闲居编》跋            | ( 66 )  |
| 晁迥与宋学                |         |
| ——儒佛思想的渗透与宋学的形成      | ( 68 )  |
| 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         |
| ——历史方法论探索之一          | ( 83 )  |
| 中国古代史记编纂形式探源         | ( 109 ) |
| 从对《辽史》列传的分析看辽国家体制    | ( 130 ) |
| 宋太宗与守内虚外             | ( 151 ) |
| 宋太宗第一次伐辽——高粱河之战      |         |
| ——宋辽战争研究之一           | ( 168 ) |
| 宋太宗雍熙北伐              |         |
| ——宋辽战争研究之二           | ( 187 ) |
| 辽国的战略进攻与澶渊之盟的订立      |         |
| ——宋辽战争研究之三           | ( 205 ) |
| 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           |         |
| ——读欧阳修《朋党论》书后        | ( 226 ) |
| 王安石的《明妃曲》            | ( 248 ) |
| 读先师邓广铭教授《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 ( 263 ) |
| 悼念恩师邓广铭恭三先生          | ( 275 ) |

|                              |       |
|------------------------------|-------|
| 宋代植棉考·····                   | (281) |
| 乔幼梅教授《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序·····       | (296) |
| 郑熙亭教授《汴京梦断》序·····            | (300) |
| 《花冈暴动——中国“劳工”在日本的抗日壮举》序····· | (303) |
| 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序·····          | (305) |
| 王育济《天理与人欲》序·····             | (308) |
| 刘秋根《中国典当制度史》序·····           | (312) |
| 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序·····         | (315) |
| 杨倩描《吴家将》序·····               | (318) |
| 陈士澍陈致远《钟相杨么起义考》序·····        | (325) |
| 《巨野县志》序·····                 | (327) |
| 《宋史研究论文集(1994年年会编刊)》序·····   | (331) |
| 《宋史研究论文集(1996年年会编刊)》序·····   | (334) |
| 报刊必须坚持双百方针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       |       |
| ——从一篇文章的遭遇谈起·····            | (336) |
|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史、执教、育人·····     | (342) |
| 从农民的分化看汉代社会性质·····           | (349) |
| 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     | (377) |
| 范仲淹的历史地位·····                | (390) |
|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               | (400) |
| 论李密在历史上的作用·····              | (423) |

##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 一、与汉学相对立，宋学是对探索 古代经典的一个巨大变革

在我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总过程中，宋代不仅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到最高峰，而且它的文化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半个世纪之前，陈寅恪先生畅论我国文化演进之态势，首先便指出了，“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接着又称尔后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sup>①</sup>。陈先生提出来的新宋学和宋学两个概念的含义是很不相同的：新宋学包括了哲学（主要是经学）、史学、文学艺术多个方面，涵盖面是较为宽广的；而宋学则指的是，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中，与汉学迥然不同的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正如本师邓恭三广铭先生所说：“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是汉学引起的一种反动。”<sup>②</sup>

汉学之所以成为宋学的对立物，主要是由于汉学内在矛盾的发展造成的。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成为经世致用、

---

①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

② 邓广铭：《略谈宋学》，1984年《宋史研究论文集》。

作育人才的大典,成为儒生们探索和研究的重要对象。然而由于文字形体的演变,从大篆到小篆,又从秦篆到汉隶,特别由于秦火之后,古代经典佚散得极其严重,研究儒经的经师们不得不从辑补、校正、训释方面入手,从而形成了汉学训诂的独特研究方法,以及经师们自己探索经典的家法。以评论先秦诸学派而著称的司马谈,认为儒家最大的缺陷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sup>①</sup>。而汉儒这一研究方法,愈益暴露了儒学的弱点。家法使经学的传承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其末流所及,墨守师说,故步自封,严重窒息了学术思想的新发展。而且章句之学,梳理爬通,已是极其繁杂琐碎,而有的经师说一二字之文,便自三五万言,则又加速度地走上繁琐哲学(Scholasticism)的道路,以至于白首不能通一经。这种治学的道路和方法,历魏晋隋唐而没有得到大的改变。只要看看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就会知道汉代经师依然统治隋唐人的头脑。任何一门学问或思想,只要故步自封,陷入繁琐哲学的泥淖,就会失去它的生命力,就会被另一门学问或思想所代替。因此,学术史或者思想史,也就形成了它自己不断更新的历史,即一门学术或思想战胜取代另一门学术或思想的历史。汉学之所以被宋学取代,不过是学术史或思想史无数更替和更新中的一个镜头而已。

宋学是以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学的章句之学的。那么,义理之学与章句之学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

认真比较起来,汉学和宋学之间,在对儒经的探索方面,确实存在不小的差别。在未进行比较之前,这里先举述如下一则有关学习方法的故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上说:

[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

---

<sup>①</sup> 《论六家要旨》,《史记·太史公自序》。

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sup>①</sup>

这是在东汉末年传统的章句之学讲授形式下，表现的两种治学态度：石广元等三人显然按照经师们的章句的传授，走上务于精熟的道路；诸葛亮则一反传统的学习方法，不务章句，而“独观其大略”，即从经的要旨方面入手，从而与石广元等大不相同。如果对上段文字的这个理解不错，那就可以说，在章句之学的全盛时期，一些杰出之士如诸葛亮即已突破章句之学的局限，从领会经的要旨出发，达到对经籍的理解，走上新的治经方法和道路。以义理之学的宋学代替了汉学的章句之学，其主要的、基本的区别在于：汉儒治经，从章句训诂方面入手，亦即从细微处入手，达到通经的目的，而宋儒则摆脱了汉儒章句之学的束缚，从经的要旨、大义、义理之所在，亦即从宏观方面着眼，来理解经典的含义，达到通经的目的。总之，从方法论上说，汉学属于微观类型，而宋学则属于宏观类型。在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宋学确实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并表现了它的独特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宋学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虽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受到许多学者并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者所重视，但在学术的研究上还没放在它应当放在的位置上。从过去的研究来看，大体上存在两个偏向。一个偏向是，把理学代替宋学。本师邓恭三先生在《略谈宋学》一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问题，“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宋学和理学之间的关系是，宋学可以包蕴理学，而理学则仅仅是宋学的一个支派。在宋学的建立中，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等人，起着奠基者的作用。然而由于过去以理学代替宋学，一些研究者们仅仅把胡瑗等人的学术思想作为理学的一个来源加以论证，于是宋学的奠基者反倒成为理学的附庸而存在的了，这显然是违背历史

---

①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实际的。

第二个偏向是,大多数的研究者们贬低了荆公学派。《宋元学案》在末尾数卷中立有《荆公新学略》,明显地贬低了荆公学派;近代学者对荆公学派虽然作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使荆公之学为世所知,从而与《宋元学案》有所不同,但也没有把荆公学派安置在当时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上,甚至安置在二程理学派之下,这尤其是违背历史实际的。试看宋人记述的如下的一则故事:

……伯淳(程颢)作谏官,论新法,上令至中书议。伯淳见介甫(王安石),与之剖析道理,气色甚和,且曰:“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介甫连声谢伯淳曰:“此则极感贤诚意,此则极感贤诚意!”<sup>①</sup>

这则故事记述了青苗法创行之初引起的矛盾斗争,是无须多加说明的,但它所反映的王安石、程颢之间的关系,则值得注意。“贤”在宋人的称呼中,一般地是先生对学生、长者对晚辈的称呼。王安石称程颢为“贤”,这说明了,王安石在程颢面前是以长辈自居的,也反映了程颢在变法之初对王安石的尊敬。当时程氏兄弟正值壮年,学术上还处于起步阶段,经过熙宁元丰十七八年,到元祐年间,方才形成洛学,在学术上露头角。他们与张载建立的关学,在整个宋学中发展成为理学,从而成为理学的创始阶段。把刚刚形成、在社会上还没有多大影响的理学,置于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在学术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荆公学派之上,是无甚根据的,因而也是不恰当的。

宋学不仅为学术的探索开创了新局面,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和

---

<sup>①</sup> 吕本中:《杂说》,《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一〇熙宁三年四月己卯注引。

突出的特点还表现在,把学术探索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上表现经世致用之学。宋学从创始阶段到发展阶段,亦即从范仲淹到王安石,一再把经世致用的经学放在社会实践上,实际上这也就是把儒生们所尊奉的“内圣外王之道”这一最高理想,不是托诸空言,而是通过社会实践付诸实现。宋学之所以在北宋取得蓬勃的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宋学之所以在南宋逐步地衰落,宋学之所以蜕变为理学,也就在于经世致用之学与社会政治生活日益脱节,仅限于“道德性命”之类的空谈,仅限于著书立说(陆九渊则走得更远,连著书也都加以反对)。把经世致用之学运用到社会实践上,不论其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注意、值得探讨的。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为过去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从来无人涉及。这大概是与政治生活脱节,习惯于在书斋中长时间地从思想到思想这一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吧!

由于对宋学的上述几点认识,本文打算对宋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看看它是怎样形成和怎样发展的,看看它又是怎样从兴盛中演变的。大体上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可以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即:宋仁宗统治期间(庆历前后)为宋学的形成阶段,其代表人物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和李觏、欧阳修,而以范仲淹为核心人物。宋仁宗晚年(嘉祐)到宋神宗初是宋学的大发展阶段,形成为各具特色的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苏学派和以洛(二程)关(张载)为代表的理学派等四大学派。其中荆公学派影响最大,在学术上居主导地位达60年之久,即使到南宋初横遭压制,但与二程、三苏之学依然鼎立而三,足见其影响的深远。到南宋,经过杨时、胡安国胡宏父子的积极努力,特别宋高宗对荆公学派打击的不遗余力,到乾道、淳熙年间形成了在社会上拥有一定势力的道学(即理学)。至此,形成二程理学派独领风骚的局面,而继承二程之学的为陆九渊的心学和朱熹的理学。整个南宋学术思想界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居统治地位,而与之对立的则是以吕祖谦、陈亮、

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为代表的浙东事功派。宋学处于演变阶段，而从宋学演变来的理学虽然处于鼎盛阶段，但在其内部也隐伏了衰落的因素。最后，将从社会历史条件来论述宋学发展演变的原因所在。所论是否妥当，还请同道们多加匡正。

## 二、宋学的形成阶段

(庆历新政前后)

宋学形成于宋仁宗统治期间，庆历新政前后(1043~1044年)是宋学形成的阶段。

宋学之在这个时期形成，从学术的渊源看，它受到中唐以来韩愈、李翱等儒家道统说和一些学者疑经的深刻影响。从形成的时代看，它是在宋专制主义统治高度发展，以及宝元、康定以来内外交迫的形势下产生的，不能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特别是宋学是在范仲淹、三先生、欧阳修和李觏等的积极推动之下形成的，不能不受到这些代表人物更加深刻的影响。因而，宋学的形成，有其学术的、政治的以及社会条件等多种因素，是较为复杂的。

(一)疑经是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继唐人之后，宋儒对儒经也提出了大胆的怀疑，认为有的经典并非出自孔子之手。欧阳修最先著鞭，他的《易童子问》是宋人第一个大胆地提出怀疑的问题。他说：

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sup>①</sup>

欧阳修认为这些篇章，“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是“昔之学易

---

<sup>①</sup>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八，《易童子问》卷第三。

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尽管《系辞》“繁衍丛脞”,“非圣人之言”,当是“汉初谓之易大传”,因为当时“学经者皆有大传”,所以也不必废去。欧阳修这种治学的态度是非常可贵的。如果认为以前的经典以及后人对经典的阐释,都是完美无缺、无任何可以厚非之处,死抱着那些古老的教条不放,包括经学在内的各种学问又怎么能够发展呢?欧阳修之所以能够提出《易·系辞》之非孔子所作,这是他对《易·系辞》及其有关材料剖析中得到的,反映了他对古代典籍的理解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鉴别审订材料的水平大有提高。这一点,半个多世纪以前,傅斯年先生在其有关史科学的著作中即已提出,并以欧阳修著作为例,说明宋人在史科学方面的进步<sup>①</sup>。

(二)欧阳修对儒经尚且采取怀疑态度,那么对儒经的注疏就更加不信任了。他在《诗解统序》中对“毛郑二家”提出批评,称“其说炽辞辩,固已广博,然不合于经者,亦为不少”。因此,欧阳修“欲志郑学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合之于经”,从而写出了一组文章:“先明其统要十篇,庶不为之芜泥云尔!”<sup>②</sup>四库馆臣们在欧阳修《毛诗本义》提要上说:“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由此说明了首先向毛郑二家挑战的是欧阳修。欧阳修对毛郑二家虽提出批评,不“曲徇”二家之说,他所作的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义”<sup>③</sup>,对毛郑二家的纠正是正确的。由此也就说明,欧阳修在宋学建立过程中,起了劈荆斩棘的开拓的重大作用。

(三)除疑经、对汉人注疏不信任这两大特色外,宋学的第三个特点是,摆脱汉儒以来章句之学的束缚,从自己对儒经理解的实际

---

①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册第364页。

② 《毛诗本义》。

③ 《四库全书·诗本义》提要。

出发,创造了义理之学,从而成为探索儒经的新途径。

胡瑗,宋初三先生之一,《宋元学案》将其列为宋代学术第一人,谓之《安定学案》,在宋学开创和宋代教育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蔡襄称瑗,“为文章皆传经义,必以理胜”<sup>①</sup>;他的讲课,由学生们记录下来,称为“胡氏口义”,保留下来的还有《周易口义》和《洪范口义》,四库均著录。《周易口义》特色是,“其说易以义理为宗”,根本不谈神秘莫测的“象数”<sup>②</sup>。这种治《易》的方法,上承王辅嗣,下启王荆公,“文义皆坦明”,为小程所宗。《洪范口义》也是以儒家思想观点阐明其义旨的,如对“恶”、“弱”的解释是:“恶与弱,皆不好德者也。好德者由乎中道也,恶与弱皆过乎中道与不及中道也。”<sup>③</sup>这显然是以中庸之道来解释的。但对食货的诠释,胡瑗非常明确地提出来,“夫圣人治天下未有不以足食为本”,“所谓仓廩实然后语荣辱之分,衣食足然后议廉耻之事”<sup>④</sup>。四库提要的作者们称胡瑗的《洪范口义》,“发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务新奇”;“驳正注疏,自抒心得”,“以经注经,特为精确”<sup>⑤</sup>。但是,胡瑗对食货的诠释,则不像四库馆臣们所说那样,而是吸收了《管子》的思想观点,予以阐发的。这里标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宋学之所以丰富多彩,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它立足于儒学的立场上,广泛吸收其他各家各派的见解,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内容,使之更加发展壮大,这就是学术界通常所说的“援佛入儒”、“援道入儒”、“援法入儒”等等,而胡瑗就是吸收《管子》思想来丰富《洪范》内容的开端者,值得在这里一提。

宋初三先生中的另一位是孙复,他以治《春秋经》名世,所著

---

① 《蔡忠惠公文集》卷三三《胡瑗墓表》。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周易口义》解题。

③ 《洪范口义》卷下《五曰恶六曰弱》释义。

④ 《洪范口义》卷上,《八政一曰食》释义。

⑤ 《四库全书·洪范口义》提要。

《春秋尊王发微》一书，与胡瑗的口义一样，“不取传注”，“其言简而义详，著诸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sup>①</sup>；“不惑传注，不为曲说，真切简易”<sup>②</sup>，“得经之意为多”<sup>③</sup>。

名列宋初三先生的石介，对经学的阐发，也是“不取”或“不惑”“传注”的，同样体现了宋学的时代风貌。

总之，宋学的建立者，从其开始即撇开了汉人章句之学，直接从经学本身来理解和发挥经学的义理之所在，宋学之被称为义理之学，即在于此。

（四）在建立之初，宋学一个更加重要的特点是，不单纯从理论上探索经学，而是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的，南宋浙东事功派即继承了这一学风。这在胡瑗的教育实践中表现得极为清楚，如材料所显示的：

安定先生自庆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余年，束修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

……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其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瑗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学以授诸生，……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也。

〔胡瑗〕又各因其所好类聚而别居之，故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皆使之以类群居，相与讲习。

---

① 《郡斋读书志》卷一下。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三。

③ 《郡斋读书志》卷一下。

胡亦特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  
对,为可否之。当时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乐从而有成。<sup>①</sup>

上述几段材料说明了,胡瑗在人才的作育培养方面有其独到的地方,不愧为一个杰出的教育家。这里说明两点。其一是,儒经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经国安邦的重要典籍,从中吸取经世致用的知识,因而士大夫们自年轻即是诵习的重要对象。胡瑗继承了此前对五经的重视,设“经义斋”,选拔一些“疏通有器局者”专门探索这个封建统治的基本理论,从这里将儒家“体用之学”传授下来,使学者们“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以经世致用。这是从大的方面对学者进行的教育。实际上,在小的方面,胡瑗也不予放松。据说徐积入太学,见到胡瑗,胡瑗猛喝一声:“头宜正。”徐积吃了一惊,从此不仅“头宜正”,而且更重要的是“心宜正”,对个人身心修养具有重要的教诲意义。薛季宣对胡瑗的作育人才给以很高的评价,他称胡瑗教育人才的“成人成己”的方法是,从“古之洒扫应对进退”开始,而归诸君子之道,即“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以达到儒生们所向往的“内圣外王”最高理想<sup>②</sup>。程颐正是从胡瑗这里受到教育和启发,把内心反省功夫放在头等重要地位,逐步形成理学一派的。

其二是,胡瑗还设立了专门性质的学科如边防、水利之类,让学生们学习,使他们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以适应社会的需要。理论(经学)和专业知识相结合,是胡瑗教育实践中的又一特色。为学好专业知识,胡瑗还将好经术、好文艺和好兵战者,“以类群居”,使具有共同爱好的学生聚集在一起,以便于共同研究讨论。这实际上是近代教育分系分科的一种胚胎形式,对学术的发展有其重要

---

① 以上诸段引文均录自《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之二《安定胡先生》。

② 薛季宣:《浪语集》卷二三《又与朱编修书》。

作用,而这种教育方法同样说明了它是如何适应了社会的需要的。崇尚实际,以及适应社会的需要,是构成宋学的重要特点,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五)由于宋学重实际、讲实效,所以宋学是以实践来实现儒生们长期形成而为宋儒特别讲求的“内圣外王之道”这一最高理想。当然,这种实践也可分为多种形式。

上面说过,儒经是作为儒生们从中寻绎出治国安邦的大道理来的,因而宋学的建立者不是把儒经当作教条,而是把对经学的研究同现实生活(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诸方面)联系起来,强调对社会生活的改善。李觏在以《周礼致太平论》为题一组文章中,共有 51 篇,包括了“内治”、“国用”、“军卫”、“官人”等许多重要方面<sup>①</sup>。由此可见,李觏研究《周礼》,不是把《周礼》作为顶礼膜拜的教条,而是作为从中找出解决当前宋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办法。即使是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只强调贬刺,无任何褒美,被常秩讥之为“商鞅之法”<sup>②</sup>。但其所以如此,在于强调“王”的这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在实际上为宋代皇帝的专制主义唱赞歌,使之立于不可动摇的地位。把理论,把著书立说,应用到社会现实中去,这也算是一种实践,自然是不完整的。

实现“内圣外王之道”,既要成德,又要立功,而立功就只有走上政治这条惟一的道路,儒生们没有别的选择。从孔夫子就提倡“学而优则仕”,通过“仕”,而行儒家之道。宋学的建立者们也都是积极地奔上仕宦之途的。石介,“非隐者也”,“其仕尝位于朝矣”<sup>③</sup>。石介任学官之后,又为孙复仕宦之途奔走,曾“语于朝曰:

---

① 《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五至十四。

② 陆佃:《陶山集》卷一二《答崔子方秀才书》。

③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四《徂徕石先生墓志铭》。